

东盟国家的外资投资热潮与产业结构调整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王 勤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在东盟国家形成了外资投资热潮。外资的大量涌入,为东盟国家80年代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转机并注入活力。本文拟就80年代中期以来东盟国家的外资投资热潮及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作一分析。

一、以日本、亚洲“四小”为投资主体的外资热潮

1985年后日元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货币普遍升值,致使在东盟国家形成了以日本和亚洲“四小”为投资主体的外资投资热潮。日本、亚洲“四小”成为东盟国家外资的主要来源。

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在60~70年代以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集中在亚洲“四小”和东盟四国。80年代日本海外投资的重点由亚洲转向北美(主要是美国),投入亚洲地区的资金相对减少。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大幅度升值加速了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日本对亚洲尤其是东盟国家的投资明显回升。据日本大藏省的统计,日本在东盟五国(除文莱)的直接投资额1986年为8.51亿美元,1987年增加到15.1亿美元,1988年达到27.13亿美元,1989年则高达46.84亿美元。根据1989年各国官方统计,日本在东盟五国当年外资排名表中均名列榜首。

80年代下半期,日本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仍以制造业为主,但也出现投资的新特点。首先,日资企业在制造业的投资已由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期集中于纤维纺织工业以及70年代后半期侧重于钢铁、造船和化学工业转向以电子电器和运输机械工业为主。日本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

投资重点在电子电器业,在泰国和菲律宾也以电子电器、汽车零部件工业的投资居多,在印尼则以化学工业、纺织业投资比重较大。其次,日本主要是向东盟国家转移面向出口和面向返销的工业制品生产基地,这与70年代日资企业以占领东道国市场为主要目标大不相同。由于日元大幅升值和美日贸易摩擦,日资企业纷纷利用东盟国家在价格竞争方面的优势,建立面向出口型的生产据点。其三,已经从过去的主要在国外设立装配工厂,零部件由日本本国供应,转向零部件生产工厂也迁往国外。日元不断升值后,过去那种由日本本国供应零部件,在东盟国家进行装配的分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降低成本的要求了,现在不少日本投资厂商正在将零部件生产工序外迁,或者提高在当地购买零部件的比率,使零部件当地化。此外,已经出现有些日资企业把整个产品的生产工序转移至东盟国家的事例,如有些日本家电厂商把窗型空调器的生产线全部迁出。

与此同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迅速兴起。60年代至70年代初,亚洲“四小”的直接投资基本上集中在东南亚国家。70年代中期以后,它们的海外投资转向美国。8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四小”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急剧增长,并在东盟四国(除新加坡和文莱)的外资投资额中名列前茅。台湾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最快,规模也大。据统计,1987~1989年台湾在东盟四国的直接投资累计额已达44.5亿美元,其中泰国为20.13亿美元,马来西亚为11.02亿美元,印尼为10.69亿美元,菲律宾为2.67亿美元。在1988年和1989年(除1989年在印尼),台湾在东盟四国外资投资额中均占第二位。香港近年来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明显增加。

据统计, 1986~1989年香港在东盟四国的累计投资额已达23.65亿美元, 其中泰国为12.64亿美元, 印尼为7.92亿美元, 菲律宾为1.95亿美元, 马来西亚为1.14亿美元。印尼1967~1989年的香港累计投资额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 泰国1970~1989年的香港累计投资额占外资的第三位, 马来西亚1971~1989年的香港累计投资额占外资的第五位。南朝鲜在1986年前每年海外投资额仅数千万美元, 1986年后海外投资迅速增长, 尤其在东南亚地区明显增加。1968~1989年9月, 南朝鲜在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额为4.877亿美元, 是除北美地区外的主要海外投资地。印尼1989年和1990年吸引南朝鲜投资额分别高达4.66亿美元和7.2亿美元, 均跃居外资的第三位。新加坡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目前, 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累计外资额中居第三位, 投资企业达149家, 近年新加坡在这一邻国的投资日趋扩大, 1987~1989年三年投资额分别为2.585亿马元、4.196亿马元和9.108亿马元。在印尼, 1967~1989年新加坡的累计投资项目为71项, 投资额为7.88亿美元。

亚洲“四小”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以中小企业为投资主体。台湾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投资侧重电子电器、纺织业, 马来西亚的台资更是多半集中于北部槟城的电子业。在印尼的台资投资额以造纸及纸浆居首位, 投资项目以制鞋业最多。台湾在菲律宾投资集中于石化工业。香港在东盟四国的投资以电子电器、纺织业为主。南朝鲜在印尼投资以纤维纺织业为主, 其次是制鞋业。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主要是电子电器、塑胶以及纺织业。而在印尼则以化学工业为主。随着中小企业的涌入, 亚洲“四小”的大型企业集团也开始步其后尘。台湾的台聚集团、宏基电脑、华夏海湾、东元电机、长荣重工等, 南朝鲜的现代综合商事、大宇电子、三星物产、鲜京集团等纷纷在东盟四国投资设厂。大型企业在东盟四国的投资, 又带动下游产业和辅助部门的中小企业的投资。

总之, 80年代中期以来, 日本、亚洲“四小”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增长之快和流量之大均是前所未有的。从发展趋势看, 东盟国家仍将是这些亚洲资本投资热点, 日本愈益超过美国成为对东盟国家的最大资本输出国, 亚洲“四小”在这些国家外资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二、外资何以涌入东盟国家

80年代中期以来, 日本、亚洲“四小”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 主要是日元大幅升值加

速日本企业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步入转型期后各种矛盾运动交织, 以及东盟国家采取措施加快吸引外资的结果。

1985年后日元大幅度升值, 加快了日本经济国际化的步伐,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也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 1983年以前, 日本每年的海外直接投资为80~90亿美元, 1984年超过100亿美元, 1985年以后每年以100多亿美元的幅度递增, 19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突破675亿美元。虽然80年代日本的投资重点转向美国 and 欧洲, 投入亚洲地区的资金相对比重下降, 但80年代中期后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流量并未减少, 而且呈现迅速增长趋势。由于日元大幅升值, 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 同时美欧与日本贸易摩擦日益加剧, 迫使日本企业把生产据点转移到海外。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发生重要变化, 由原先在国外设立装配工厂而零部件由国内供应, 转向零部件生产工厂也大量迁往国外, 其中相当数量转移至东盟国家。近年来, 因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货币升值和劳动工资上涨, 也使日本制造业厂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工序从亚洲“四小”转向东盟四国。为回避美欧和日本贸易摩擦, 日本企业除直接到美欧本土投资设厂外, 近年纷纷将本国生产厂家迁移至东盟国家, 建立面向美欧市场的迁回生产基地, 从而使日本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不断扩大。

亚洲“四小”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 主要是其步入转型期经济的各种矛盾运动交织的结果。60年代中期后, 亚洲“四小”的出口加工主导型经济蓬勃发展。到了70年代末, 由于内部劳动力日渐短缺, 劳工成本不断上升, 而外部受到发达国家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来自邻近地区的竞争, 使建立劳动密集型基础上的出口产品日益丧失竞争能力。70年代末, 亚洲“四小”相继进行以产业结构为核心的经济调整, 但普遍进展缓慢。进入80年代中期, 由于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 亚洲“四小”货币大幅升值, 这不仅直接影响其出口加工主导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而且使步入转型期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亚洲“四小”的工资成本升幅加大, 劳工短缺日趋严重, 投资经营环境明显恶化, 抑制了民间投资意愿。例如, 台湾1986~1989年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升值55%, 工资上升87%, 地价高涨3.1倍, 劳资纠纷增多, 环保限制加强, 社会治安恶化, 使岛内投资意愿日趋低落, 投资不足现象愈益普遍。1987年台湾当局取消外汇管制后, 加速岛内过剩资本大量外流。此外, 1989年美国取消亚洲“四小”的普惠制贸易优待, 促使亚洲“四小”劳动密集型中小企

业踊跃到海外投资,尤其是涌入邻近的东盟四国。

如果说,日本、亚洲“四小”海外直接投资是以其产业结构调整中资本矛盾运动为动因,那么这些亚洲资本大量涌入东盟国家则是这些国家采取措施加快吸收外资的结果。80年代中期以来,东盟国家普遍调整了外资政策。首先,放宽对外资的政策限制。泰国规定制造业部门的外资不受股权限制(服务业限于49%以内),并可内销产品的20%,允许外资企业在当地拥有土地,并开放房地产、金融、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部门;马来西亚规定外资在投资头五年可拥有100%股权,产品50%外销或就业超过350人的企业也可独资经营;印尼相继颁布放宽外资管制的一整套措施,延长外资投资和股份转让期限,将限制外资投资的273个行业减至75个,降低外资的最低投资限额,由原来的100万美元降至25万美元,以吸引中小外资企业投资,同时取消318项产品的进口配额和进口垄断,还允许外资经营当地批发业和内陆航运业;菲律宾修订了外资条例,提高了外资企业的持股比率,放宽免税期和进口限制,简化外资投资程序,缩短项目审批时间。其次,提供各种优惠措施。泰国规定对投资出口产业、开发当地资源和创造较多就业机会的外资企业,豁免3~8年的所得税,并免征机器、原料的进口税和产品出口税;马来西亚的外资企业可享有新兴工业地位、投资税务优惠、调整后收益回扣及出口奖励等条款;新加坡提出鼓励跨国公司在当地设立区域营业总部的政策,规定凡在当地设立营业总部的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所赚取的股息,在汇回国内总部时可免缴预扣税,从海外子公司赚取的其他盈利仅交10%的税,而不是33%的公司税。其三,大力规划和兴建外商投资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和吉打两州开辟台湾工业区,兴建双溪大年“台湾电子出口加工区”,柔佛州设立南朝鲜工业区;在印尼,规划和兴建雅加达、泗水和北苏门达腊三地台湾工业区,开辟南朝鲜石油化工区和电子工业区,还与新加坡合资开发峇淡工业区;在泰国,与新加坡联合兴建大城工业区,由港商筹资兴建电子城等。

三、外资涌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经历了两个阶段。80年代上半期,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全面经济衰退,以及国内经济政策的某些失误,导致这些国家经济普遍衰退,产业结构调整也因此陷于困境。80年代下半期,由于日元和亚洲“四小”货币的大幅升值,引发日本和亚洲“四小”资本大量外流和产业技术转移,这一突变的国际经济形势,给已趋于停滞的产

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带来转机。以日本、亚洲“四小”为投资主体的外资大量涌入,对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日本、亚洲“四小”的直接投资和生产工序迁移,推动制造业增长和结构变化。日本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以制造业为核心,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期以纤维纺织工业为主,集中在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此影响下,东盟国家的工业化相应出现纤维纺织产业迅速兴起。到70年代末为止,马来西亚、印尼的化纤产品全部是日资企业生产的,泰国和菲律宾由日资企业生产的化纤产量分别占其总产量的60.9%和79.1%。继之是钢铁、造船、石油化工部门的发展。新加坡大力引进日本的造船和炼油业投资,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船舶修理中心和炼油中心。进入80年代,尤其是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在电子电器业的投资比重不断提高,促进东盟国家电子业的迅速发展。目前,东盟国家已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电子电器业生产和装配基地。新加坡电子电器业已超过炼油业和海事工业(包括修造船及钻井平台制造),而居制造业三大支柱之首。马来西亚电子电器业发展更为迅速,现已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二大半导体出口国,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室内冷气机出口国,而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厂家则是主要生产者。近年来,日本三菱、丰田等汽车厂商在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投资,使这些国家的汽车工业从无到有。1988年泰国首次向加拿大出口的汽车,则是由日本三菱公司在泰国的合资企业生产的。亚洲“四小”在东盟国家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也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注入了活力。

其次,日本、亚洲“四小”的直接投资促使东盟国家出口贸易迅速增长。80年代以来,尤其是日元不断升值后,日资企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动因由70年代以当地市场为目标转向面向出口为主。这种投资转向,一是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以加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二是建立面向美欧的产品生产基地,以此来逃避美欧对直接从日本本土出口的产品所施加的限制措施。进入东盟国家的亚洲“四小”企业许多也属这种面向出口型投资。例如,在马来西亚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生产的室内冷气机95%供出口,其中销往美国市场的占1/3。在新加坡日本爱华公司的产品90%供出口,其中48%输往美欧国家。亚洲“四小”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鞋类等)企业也主要是通过东盟四国的出口配额,将产品输往欧美市场。同时,因日本部分开放了进口市场,并在东盟国家建立起面向返销的工业制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东盟国家的日资投资企业的返销比率已有所提高。日本、亚洲

“四小”的直接投资集中于面向出口产业,促进东盟国家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据统计,1980~1990年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额从711亿美元增至1321亿美元。以泰国和马来西亚最为明显。泰国1987~1989年三年出口贸易增长率分别高达29%、36%和30%,1989年出口值突破200亿美元。目前泰国鞋类出口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增长,出口值居世界第三位。纺织品出口从1986年的12亿美元猛增至1989年的32亿美元,1986年起纺织品出口超过稻米而居国内出口的第一位。马来西亚1989年电子产品出口额达179.33亿马元,增长率为53.8%,电子产品出口已占国内出口总额的26.4%。

再次,日本、亚洲“四小”投资企业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技术转让。日本、亚洲“四小”的直接投资大量集中于制造业,又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因此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就业机会的增加。据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的统计,1971~1989年2月外资直接投资累计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分别为:日本企业11万人,新加坡企业11.8万人,香港企业9.5万人,台湾企业4.8万人。另据报道,新加坡制造业职工的17.5%是日本企业的雇员。在技术转让方面,虽然东盟国家无不抱怨日本投资者对技术转让十分保守,但日资企业为获得较高利润和取得技术的竞争优势,还是转让了一些东道国所需的技术。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在80年代初的实地调查表明,在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吸收的外来技术中日本技术均占首位。80年代中期,日本松下电器、日立制作所、日本电气、东芝等大企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设立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工厂,台湾、南朝鲜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投资的大型钢铁厂、石油化工厂等,无疑对提高当地产业技术起着积极作用。

最后,日本、亚洲“四小”的直接投资和资源转移,促进了亚太地区产业分工新格局的形成与发展。80年代,亚太地区新的产业分工格局已现端倪:日本已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其产业结构呈现高技术化、信息化的特点;70年代崛起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其产业结构转变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导;80年代中期,新兴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正摆脱落后状态,

其产业结构已从农矿原料和初级产品加工转向以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品为主。这种区域产业分工机制的形成和传递,主要靠以跨国公司为为主体的直接投资和资源转移来实现。80年代中期以来,日资企业已将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工序转移到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并开始将原先在亚洲“四小”设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工序转向东盟四国。同时,亚洲“四小”也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整厂或部分迁移到东盟四国,这就进一步推进区域内产业分工尤其是水平分工的发展。目前,不少在东盟国家的日资企业已在日本和东盟国家之间形成“生产过程分割”型水平分工,即高技术产品由日本厂家生产,设在新加坡工厂生产高增值产品和配件,而将初级产品转由其他东盟国家分厂生产。日本丰田公司还在东盟国家之间推行汽车零部件互补计划,即投资2.15亿美元由马来西亚制造操纵装置,菲律宾制造变速器,泰国制造电气设备和柴油发动机。日本东丽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工厂装备500台先进的喷气织布机,它所使用的纤维来自其印尼分厂,然后又将产品运往新加坡的服装厂,最后将服装销往国际市场。

诚然,以日本、亚洲“四小”为投资主体的外资投资热潮推动了80年代东盟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工程。但是,由于在短时期内吸收了大量外资,也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例如,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外资对东道国国内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较小,对国内其他产业部门的直接带动作用不明显;外资流入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形成对当地中小企业的竞争;外资所拥有的资本和技术资源方面的竞争优势,抑制了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因短期内大量外资涌入,造成当地经济过热,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目前泰国的交通通讯设施严重不足,能源供给紧张,建厂成本高涨;有些外资企业因其国内环保限制而外迁,而这些企业却污染了当地的环境,如日本三菱公司在马来西亚霹靂州所设亚洲稀土厂产生的有害放射性物质严重地污染了周围环境。所有这些都是东盟国家在调整产业结构和引进外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 肖庆山)